



2月21日上午10点,张汀先生去世了。他生前每一场画展开幕,都婉拒花篮;到人生谢幕的这天,还是婉辞“瞻仰”。他曾对师母灰娃说,不喜欢看别人的遗体,也不喜欢别人看自己的遗体。不愿意一个人最不好看的定格形成难忘的印象。这是一个真正的美术家最职业的理想——他把完美,坚持到生命的尽头。

没有遗体告别,没有追悼会,春节的浮华与喧嚣,更让张汀的离去显得静悄悄。与疾病斗争的5个月间,他本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放弃,但他却要坚持过完春节,想是为了不扫大家的兴,趁一场节庆的高潮来到,人们的注意力转移,自己悄然退场。这是平民张汀草根品格的最后体现。但是,中国就这样不经意地又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儿子。

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舞台上,张汀绝对是一位主演——不是某一场的主演,而是全剧的主演。生于1917年的他,自幼习艺,以艺为生,投身进步事业,少年即被判入监三年半,以后跻身鲁迅所代表的文化力量,参加抗日漫画宣传队,发起创建左翼美术家联盟。1938年,张汀去了延安,为中国共产党带去一批急需的军用物资,那是他说服一位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官提供的。后经毛泽东亲笔推荐,周扬安排,张汀成为延安鲁艺最早一批的教员之一,也是最年轻的教员,亲聆了“延安文艺座谈会”。他把美的理想带到了延安,从延安点燃,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建国事业、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加油添薪,助推中国美术事业日臻兴旺并呈燎原之势。

1945年,张汀参与续建了东北鲁艺,创办东北画报。1949年,他担任开国大典总设计师,参与国旗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美术设计工作,亲手设计了政协会徽和以天安门为主体形象的国徽方案,参与了开国大典的彩车、旗标及天安门城楼灯笼的配置设计等。在1951年至1957年间,还曾以中国官方派出的最高专家代表身份,承担了德国、波兰、捷克、匈牙利、苏联、法国的世界博览会中国馆或中国宣传展的总设计,大受欢迎。有的场馆竟险些被主办国整体购藏,极好地推广了新中国的形象。50年代,他还受命参与创建了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,作为两院专家领导,直接实践“中国画百日写生”、“民间艺术进课堂”、“装饰艺术学派化”及“中国艺术设计教育系统营建”等重要的美术教育体系

张汀,未见遗容的道别

邹文

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时常光顾。张汀改造不了中国,却成功改造了中国的一个象征物。

青少年时代的张汀,总可以将世事的无奈化解于积极进取的行为中。但随着年事渐高,他也发现有些无奈不能化解,如虚伪、庸俗、权欲、阴暗面、艺术在市场化中的失魂、民间美术的消弱、“大师”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自尊的放弃以及“美盲比文盲多”的社会危机现实等。最大的无奈是岁月的侵蚀。尽管张汀总有视死如归的沉着和彻悟,但一个转移战场到生死前线的战士,还是本能地要同命运一搏——早在8年前,张汀在天坛医院被确诊罹患脑瘤,医生预言如此严重的病患不做手术,维持不过一年。2005年,他又住了医院,却是因为肾的问题。医院很惊异那个强大的脑瘤,竟会被这位80岁的老人击退了,而眼前的肾病,通常对年轻人都是致命的,存活率极低。张汀出院凯旋,我曾多次陪他外出,每次他都很在意地先梳理一番头发、胡须,穿上他的对襟布衫,拿上他的手杖和烟斗,他英雄般的腰背永远挺直,一股豪迈、自信之气,会使人从人群中被轻易识别出来。然而,毕竟年老,他要随时上厕所。有次他内急难忍,只好在一间只有蹲坑的饭馆厕所里靠在我膝盖头上大解,并不得不让护理人员擦拭。他那次显出失意和沮丧,如那只雄狮中箭负伤倒地,让人看见了它有些失败的一刻。他的这份歉疚,恰恰反映出一位90岁老人内心的不屈服,说明他一直在同命运较着劲呢。然而命运很残酷很强势,日历不停地在提醒他的倒计时。他天天看鲁迅,精神依然顽强,身体却呈衰退,皮肤瘙痒到经常需要很挠。终于,5个月前,他再度住进了医院,医生为了治病,剃去了他那招牌性的胡子。心电图起起伏伏、上上下下,成了他最后的运笔。夫人已兼揽助理、秘书、保姆、通讯员于一身,无微不至照顾他,但还是只能无奈地看着他生命的火光变成一缕烛光。张汀的血压几次降到危险重又升起,医护人员被折服了,他们近距离地看到一颗战士的心,一位巨人的意志力。主治医生甚至惊叹于眼前发生的生命奇迹,一般人握不过张汀十分之一的弥留时间。而近5个月来,不能同大家交谈的张汀,一定是在另一深处把抗敌的斗争,专注于同命运的最后一搏。

到了21世纪,张汀的阅历与资历,少有美术家可比,但在名利方面,张汀始终保持低调。悄悄谢幕,正是他在名利面前心如止水般安静的必然反映;但战士性格中的抗争基因,却令他的悄然退场不合逻辑,他像希金、马奈,闻一多一样,应享受万人的送别,然而他却留遗憾,要彻底归于平淡,这位曾经绚烂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化骄子,想让自己不受注意地长眠在京郊某处的平凡山坡。

我曾经在法国与瑞士边境的一座小城,看到一尊凿于山崖的负伤雄狮的浮雕。雄狮代表着一个伟大的灵魂,被世俗之箭与岁月之箭射伤倒地,它低垂着头,静默地等待死亡,战士的意志和英雄的气节却凛凛然挺立着。我被这英雄无奈的悲剧之美深深打动。而终于被世俗和时间射伤的张汀英雄,也有某种无奈。青少年时期,他想重建家园、改造中国,但很难很无奈。1938年在延安,他和肖军等人发现一处废弃的大房子,想到鲁迅曾把中国比喻为一个门窗破日之屋,他们于是对这所大屋子加以翻新装修,创造了当时条件下十分理想的中国袖珍图景——作家俱乐部,毛泽

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时常光顾。张汀改造不了中国,却成功改造了中国的一个象征物。

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时常光顾。张汀改造不了中国,却成功改造了中国的一个象征物。



张汀独创的焦墨山水

了能直抒胸臆的最好题材。于是,从这时起他便多次前往漓江写生,每次一住就是几个月,整个身心都沉醉在自然的美景中,不知疲倦地从早画到晚。他有时站着画,有时坐着画,跑过来、走过去,兴奋不已,经常是尽兴画完后,才发现早已日落多时,于是只能在昏暗中回返,在憧憧山影中四顾——夜幕中的山林树木早已变了模样,竟茫然不知归途。

1977年,他第二次来桂林时,师母已重病在身,没等他回去就心脏病突发过世了。当时白先生

正在桂林火车站创作巨幅山水画,闻讯放下画笔匆匆返京。办完丧事后,大家都劝他休息一段时间,但他仍然割舍不下未完的创作,强忍内心悲痛,又急忙赶回桂林。

功夫不负苦心人,三次桂林之行白先生画了上万张写生稿,作画200余幅。他爱漓江,在他的画中,从不照搬自然界的景物,而是紧紧抓住桂林山水与众不同的形象和神态,大胆剔除那些非本质的细节,汇集最优美、最有特色的山川草木,加以浓缩夸张,使之更加鲜明、更有魅力,以致画中的景色比真实的风景更美、更迷人。很多人曾经对照白先生的画作专程去寻找相同的风景,却根本无法找到,只能失望而归。

白雪石先生的画淡雅清爽、色调明快、以情入画、雅俗共赏。如今,除在报刊、画册、展会、大宾馆、机场贵宾厅等地均可一睹他的艺术风采外,他更有百余幅丈二以上的大型杰作分别陈列在中南海、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纪念馆等国家重要场所。

因为国家外事工作需要,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,白雪石先生接受了大量为国家重要场所绘制的政治任务,至今完成的大幅布置画已多达百余幅,特别是中南海接见厅那幅在电视中频频展现的高5米、宽9米的大画,堪称“山水之王”。每当白先生面对高墙阔壁般的素纸举重若轻、挥洒自如而又一笔不苟地作画时,观者可能会佩服得五体投地,但殊不知看来气定神闲的他,正在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着一个巨大困难——恐高症。白雪石先生生来胆子小,经常到山前都不敢攀登,而巨幅大画不仅需要长时间地站在升降机上绘制,还需要随着画面布局的变化在高空不断移动,在绘画过程中,只好整天在半空中飞来飞去。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锻炼,真是难为这位古稀老人了!用他自己的话说:“拼了老命了!”每当我们面对这些他在耄耋之年绘制的巨幅大画时,不由得感慨万千,白先生这种呕心沥血、献身艺术的精神真是我们后生晚辈的榜样!

我的老师白雪石

王兆辉

50年前,我在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上学,校舍就在后海边那座著名的恭亲王府里,学院教师中人才荟萃,其中很多人如今已成为名声显赫的大家。我上学那年,邵晶坤27岁、吴冠中36岁、白雪石45岁、李瑞年49岁、卫天霖61岁……他们不仅画艺精湛、教学认真,而且人品出众,令我们这些学生受益终生。

白雪石是我的老师,给我印象极深。他身材不高,慈眉善目,特别和蔼可亲。在教我们的那些年里,因为子女多,家庭负担重,白先生的穿着打扮和生活方式都相当简朴,总是一件普通的蓝布褂,手拎一个旧的小书包,见人也总是面带微笑。他平日寡言,不善交际,谦虚朴实、不善言谈。在教学中,每当学生有疑问时,除了耐心解答,他还往往会提起画笔画给你看,虽寥寥数笔,但恰到好处地排疑解难。让学生们心服口服。

白先生那个时候住房条件很差,六口之家就住在鼓楼后大石桥胡同的一座小平房里,即使1979年搬到和平门的新居后,画室兼居室也只有14平方米,屋内还高悬着一幅董寿平先生专门为他题写的匾额——何须斋。白先生对“何须斋”的解释是:“知足者常乐,我的画室兼会客室虽然小,但俗话说‘室雅何须大,花香不在多’,因此取名何须斋。”白先生住在三楼,楼下二层住着我的另一位老师俞致贞先生。谁知这座楼并不是能安静做学问的好去处,楼前有一所小学,孩子们的喧闹之声终日不绝,我们不得不佩服白先生在这样的环境里还画出了一幅又一幅杰作。

我毕业三年后,白雪石先生调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。但是我们这些学生每当想念老师、或者希望在画艺上得到老师的指点时,都可从那时到白先生家拜访。白先生仍然那么踏实、勤奋地每天作画,他的画风朴实含蓄,从不虚张声势,更不哗众取宠。我们亲眼看着他的画越画越好,但他自己却总是不满意,始终想从传统画法中跳出来,更多地体现现代人的审美情趣。为了这一目标,他长期不懈地探索着,终于在上世纪70年代迎来了一次巨大飞跃。

1973年,白雪石老师58岁。这一年他参加了布置首都宾馆的创作活动。应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邀请,白先生赴广西桂林,沿漓江两岸徒步旅行写生。从广西兴安到阳朔近200里的桂林山水迷住了他:碧绿的漓江蜿蜒穿过一个又一个奇峰,两岸片片芭蕉翠竹,掩映着灰瓦白墙的村寨,风光绮丽,气氛宁静。这奇丽的景色让他激动,他四处奔波写生,一画就是一整天。在这里他终于找到



桂林山水甲天下(水墨) 白雪石

飞扬的生命

——考尔德的动态雕塑

舒雅



铝叶子(雕塑) 考尔德

亚历山大·考尔德是美国最富人气,而且跨越国际拥有最高声誉的现代艺术家之一,更是20世纪雕塑界最重要的革新者之一。这位美国雕塑巨人,以创作风格独特的“活动雕塑”和“静态雕

塑”驰名于世。

雕塑应该是富于稳定性的活动,然而,把考尔德的藝術同一般雕塑家的艺术相对照,这种说法就错了。考尔德所从事的活动远非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,他并没

有用黄金和青铜作材料,要把雕塑永远定于一隅的意图,而是用那些微不足道的、不协调的物质材料,如碎薄片、锡或锌等,把它们制作成为新奇的主干和环绕着它的许多分枝,以及圆环、羽饰和花瓣。它们就像共鸣器或是暗道机关,可以自由摆动地悬挂在一根纤细的金属丝的一端,就像一只大蜘蛛自由地悬挂在丝线上一样。或者,它们被固定在一个垫座上,无精打采,筋疲力尽,佯作睡状;一阵微风的振动,就会触发它们,于是它们便立刻生机勃勃,产生诱人的魅力——你将见到一种不断运动的、靠气流而转动的活动雕塑。

考尔德让雕塑产生运动,其用意在于满足人们的精神愉悦,使人产生视觉快感。但它们也有另一种深刻的、形而上的意义,原因在于这种动态雕塑必有运动根源。早先,考尔德使用了一种电动马达,后来他又放弃了那种类型的活动雕塑。现在的作品,如果安放在一个花园里或是放在一个打开了的窗口边,在微风的振动

之下就会像风鸣琴一样歌唱。它们以空气为能源得以呼吸,并从大气层稀薄的生气中获得自己的生命,因而它们的运动就有超越出一般活动的性质。

之下就会像风鸣琴一样歌唱。它们以空气为能源得以呼吸,并从大气层稀薄的生气中获得自己的生命,因而它们的运动就有超越出一般活动的性质。

之下就会像风鸣琴一样歌唱。它们以空气为能源得以呼吸,并从大气层稀薄的生气中获得自己的生命,因而它们的运动就有超越出一般活动的性质。

考尔德艺术创作的领域很广,从巨大的钢铁雕塑、绘画、挂毯到精致的宝石设计,作品分布于世界各国的公共空间。他的静态雕塑,给人以蜻蜓点水似的轻飘舞姿之感,非常适合衬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都市的高楼大厦。而他的活动钢铁雕塑,只用物理重心平衡杆的原理,靠风力产生不停的动态平衡状态,既不是有生命的,也不完全是机械的,它们持续不断地变化着,然而最终又总是转回到它最初的状态。就像水生植物被一条奔流的小溪冲得弯腰低头,像那十分敏感的植物的花瓣,像无头青蛙的腿或是蛛丝粘附在一种通风机上。

考尔德的活动雕塑常常显示出一种犹豫、复活、摸索、笨拙的举动,或一种出其不意的果断,尤其是它们那不可思议的、像天

鹅般的高雅,使得这些雕塑品简直成为奇特的动物处在物质与生命之间。有时它们的运动似乎是什么意图,而有时似乎又放弃了这种意图而陷入可笑的动摇不定之中。

考尔德小名叫Sandy,画友多以“山帝”相称。早年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史蒂芬技术学院拿到工程师文凭,接着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习画。20世纪30年代在巴黎与超现实主义画家交往。他的作品与米罗的超现实作品有着某种相似——风趣、诗意、木讷是最好的形容词。他不是一位“劳碌命”的艺术家,而是想工作才工作,有点偷懒的工程师个性。

考尔德一生奔走于大西洋两岸,美国的家在康涅狄克州的农场,法国的工作厂房则在巴黎西南郊外100多公里的Saeche村落。他的雕塑可以说是早期美国人垦荒精神的再现,但他在法国的声望也很高,因为他喜欢欧洲的传统,这一点对欧洲人很重要。可以说,考尔德的创作完全打破了国与国之间的界限。